



1938年



1956年



1979年



丁东 主编

丁玲

邢小群 著

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历史的真实往往令人震惊

历史就是对历史现场真相的探究

真相的获得，需要勇气 and 责任感，需要探索，需要发现



丁东 主编

丁玲

邢小群 著

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邢小群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80765-706-4

I. ①丁… II. ①邢… III. ①丁玲(1904 ~ 1986) - 生平事迹②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史研究 IV. ①K825.6②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7167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10 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伯乐、盟主与山头(代序)

今年1月,老作家胡正在太原去世。山西许多作家都写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韩石山一向很牛,在胡正的灵前却不由得跪下。他说:想也没想,就那么跪下了,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我的敬重之情、感恩之情。想当初,批判精神污染,还在县城教书的他被当成了靶子。胡正却不管这些,抓紧把他调进省作协,还安排他当了《黄河》杂志副主编。六十岁上下的这一代山西作家,大多都有着被马烽、西戎、胡正等人发现、培养、扶植的经历。周宗奇说,当自己在一些报刊发表了10篇中短篇小说之后,依然难以从煤矿井下走上来,改变处境。是马烽、西戎、胡正到基层找“好苗子”时发现了。李锐说,当他刚从插队知青变为钢铁工人时,“胡正和西戎同志来到了临汾”,从此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最终“在马烽老师的直接帮助下”调入《汾水》编辑部。张石山原先是火车司炉,“文革”中牵连到“反标事件”,山西作协调他时遇到阻力,西戎说:这个人有人命没有?没有人命,给我调来!郑义在晋中师专上学时,写出轰动一时的小说《枫》,后也被西戎千方百计调入山西作协。这一拨当时的青年作家,先后被推上《山西文学》《黄河》主编、

副主编的位置,背后都是时任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胡正拍的板。可以说,有马烽、西戎、胡正做伯乐,方有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界的晋军崛起。

当时中国文坛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是湖南。湘军的阵势也不亚于晋军。读康濯的纪念文集,知道古华、莫应丰、韩少功、谭谈、谢璞、张扬、萧育轩、叶蔚林、水运宪、叶之蓁、蔡测海、刘舰平、何立伟、彭见明等这些湖南的才俊,都得到过康濯的支持和提携。他为《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发表一锤定音;为《爬满青藤的木屋》《芙蓉镇》的修改与作者长夜交谈;为张扬的平反出狱奔走呼喊,不遗余力。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会看到许多文坛新秀的崛起,都有老作家的帮助。赵树理发现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初稿时,稿子还有着很多错别字和图画符号。赵树理、康濯、田间都帮助陈登科修改过稿子,使小说得以出版。此类文坛佳话屡屡传诵,不一而足:冯雪峰之于杜鹏程,陈企霞之于徐光耀,茅盾之于茹志鹃,孙犁之于铁凝;乃至叶圣陶之于丁玲,鲁迅之于萧红、萧军,胡风之于七月诗人与作家,郁达夫之于沈从文,沈从文之于汪曾祺;周扬之于延安鲁艺的学员,丁玲之于文学研究所的学员,可以说伯乐发现千里马,是文坛的规律性现象。

艺术需要天赋。文学是语言艺术,自然也需要天赋。现代高等教育引入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人才方式,大学可以培养学者,却很难培养作家。作家的写作能力实质上都是凭着一定的天赋,靠着自己的悟性摸索出来的。但新作家被社会承认,往往需要已经获得社会承认的老作家的发现和认可。尤其在互联网出现以前,

一个无名作家写得再好,如果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还是会被埋没。过去实行国家把文学全都包下来的体制,一个有文学才华和潜质的人,能不能获得体制的认可,对于他天赋的发挥,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一个执掌作家协会领导权的老作家,或者一个有权发放通行证的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主编、责编,既可以让一个新作家破土而出,也可能让一个天才永远埋没。北京、上海这些文化中心城市,出作家多一些不奇怪;而到了省城一级,有的出作家多,有的出作家少。同样的大历史环境,文学发育程度差别很大,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作家协会有没有伯乐当家。有,就可能使新作家在几年内成群地涌现;没有,就可能让当地的文坛一派萧条。

这种老作家和新秀之间的发现与被发现、提携与被提携的关系,古往今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师徒关系。那些声望高、气场大,或在体制内握有评奖、人事安排等权力,善于慧眼识珠,有发现新秀的历史自觉性的人,往往成为一方文坛的盟主。盟主不同于行政隶属关系,而是艺术修养、文化声望和人格魅力的体现。

丁玲曾经就是这样一位伯乐,一位盟主。她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提携过徐光耀、陈登科等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经历了20多年的不幸,到了80年代,她还想再现当年的辉煌,却遇到了极大的困扰。给她当过秘书的王增如,最近发表了长文《丁玲办〈中国〉》(《江南》2010年第6期),对丁玲晚年遇到的困扰有生动的披露。

1984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在主任丁玲的提议下,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当时邀请了20多位中青年作家,张洁、李陀、陈建

功、梁晓声、陈祖芬等获奖者都没有到会，获奖作家座谈会却成了老作家的聚会。中青年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丁玲又摆家宴，请邓刚、史铁生和唐栋三位获奖的年轻作家来家吃饭，以表达对他们才华的欣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并请了几位老作家作陪。王增如观察：那天下午谈了3个小时，老作家说得多，尤其丁玲说话最多；三个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都有些失望。晚饭毕，青年作家告辞说：“丁老，这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走了，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冯牧和丁玲住在一个大院。丁玲听了，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1985年，冯牧主持《中国作家》创刊座谈会，80多位当红作家都出席了，其中包括未曾出席丁玲主持的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年轻作家对丁玲与对冯牧的不同态度，使丁玲的内心真正受到了刺激。

对这种反差，王增如有如下评说：老作家们对于几个年轻人要去看冯牧，很有点儿想法：“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你把心掏给他们也不行，他要看你有没有实权。”“你也不能怪他们，作协那里掌握着出国、评奖的大权，我们这些老家伙有什么？连发表一篇稿子的权力都没有，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好？”

这样推测当时的青年作家们的心理，主要着眼于现实功利角度。但我觉得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其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左右问题，其二是山头问题，其三才是利益问题。

丁玲在1979年获得改正，重归文坛以后，在一些场合发表过

相对正统的言论。这些言论与社会舆论对她的心理期待有很大距离。于是,这位 50 年代的大右派,到 80 年代被视为“左派”;而 50 年代的“左派”周扬,却被当成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责令检讨。这种格局,使关心现实的青年作家们,情感很容易倾向周扬以及接近周扬的冯牧一边。

山头,在官方的作家协会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周扬从左联到延安鲁艺到新中国成立后执掌中国文艺界领导权到新时期重新恢复工作,始终是一个盟主的角色。但左翼新文学的盟主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互相形成不同的山头。30 年代在上海,周扬与鲁迅就有摩擦,由鲁迅而冯雪峰、胡风、丁玲是一个脉络,从周扬到张光年、冯牧等人是又一脉络,实际上不同山头的对垒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青年作家,一进文坛,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同山头的对垒之中。这就是中国大陆官方文坛的历史和现状。某一青年作家未必想投身某一山头,但山头之外还有多少追求独立的空间,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两个山头的对峙或暗中较劲,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价值尺度,要么是你“右”我“左”,要么是你“左”我“右”,要么是你“左”我更“左”,要么是你“右”我更“右”。从最“左”到最“右”,是一个何其宽阔的价值光谱!如果在出版自由、价值多元的空间里,一个刊物、一个社团自可以寻找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趣味,自己的价值定位。但在当时,处于价值光谱中间地带又有艺术才华的文坛新秀,几乎都已经聚集到了冯牧的麾下。因为当丁玲带着沉重的历史问题的枷锁重归文坛的时候,周扬已经先一步成为文坛思想解放的领袖。丁玲创办《中国》的初衷,曾经是想帮助老作家们有一个发

表的园地,但一个杂志的生命力还是要靠对广大读者的吸引,所以把当红的文学新秀团结在自己杂志的周围,也是丁玲的心愿。况且丁玲与一些老作家们是真心喜欢像《那人那山那狗》《琥珀色的篝火》《船过青浪滩》《兵车行》这样的作品,特别是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赞赏,并没有青年作家想象的成见。他们甚至表示说:写得相当好,水平相当高,我们也在陕北生活过,可我们没有写出来。丁玲设家宴作为与作家们交流的一种方式,也是她的传统风格。结果是慢了一拍。丁玲送来的温暖至多不过是锦上添花。

山头的对垒和左右的冲突并非完全重合。丁玲虽然被视为“左”,但她支持和信任的《中国》副主编牛汉甚至比周扬麾下的作协主事人更“右”,他接纳了比当时号称思想解放的文坛主流更前卫也更边缘的作者。在80年代,有一些比主流更先锋的少数青年作者处于边缘地带,还受着打压,需要雪中送炭。毕竟,受到“胡风案”不白之冤的牛汉是有眼光有魄力的,他通过《中国》给这些更边缘的探索者提供了一个表达的出口,这也是《中国》之死的原因之一。《中国》之死,是体制原因、经济原因、山头原因、意识形态原因综合发酵的结果。

因此我想,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青年作家们,还是在艺术表达上更前卫的作家们,都在伯乐与山头之间遇到了尴尬和无奈。伯乐对于文学的发育无疑是积极因素,山头对于文学的发育却可能成为负面因素。山头对伯乐功能的扭曲,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2011年4月

目 录

伯乐、盟主与山头 1

引 言 1

第 一 章 为什么要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 2

酝酿 2

作家队伍的格局 6

新体制需要哪类作家 14

第 二 章 文学研究所成立的前前后后 17

沈雁冰的批复 17

为什么不能叫文学研究院 19

班子问题,学员问题 21

供给制 31

第 三 章 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影响 41

心里的模式 41

丁玲的选择 44

第四章 文学研究所的教学内容与形式 47

开学 47

办学宗旨 48

课程与师资 48

第五章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 54

文学研究所成了丁玲的“滑铁卢” 54

关于“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 57

关于“一本书主义” 58

关于培养“个人崇拜” 61

作为文学导师的丁玲 63

丁玲的办学思想与深入生活 68

“文艺党校” 73

两个丁玲 75

第六章 从“文研所”到“文讲所”的波折 83

缩小规模 83

公木的学院情结 86

文学讲习所停办 88

文学研究(讲习)所的成果 90

第七章 丁玲挨整之谜——谁整丁玲? 92

丁玲与毛泽东 93

丁玲与周扬 101

导火线——三封信 115

“丁、陈反党集团”是谁先提出来的? 124

我的看法 134

尾 声 142

附 录

徐刚访谈 144

邢野访谈 191

张凤珠访谈 196

徐光耀访谈 216

朱靖华访谈 227

王景山访谈 238

王惠敏、和谷岩访谈 246

葛文访谈 253

陈明访谈 260

郑重访谈 278

丁玲在文研所的六篇讲话 285

引 言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它的存在,前后只有七年的时间。如果从共和国文学几十年的历程看,它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以往,人们对它没有专门的论述,因为这几十年的文学历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只有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些文字中,才能见到与文研所的联系。但是,如果把文学研究所作为一种文学体制的发端和建设来看,就会看到它的创办正是共和国文学体制形成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重要现象。它的兴衰,与这个体制是什么关系?这些正是我所要探讨的。

第一章 为什么要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

酝酿

20 世纪中国的文学体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的体制以作家个体创作、文学市场自发调节为主要特征。后一段的体制则以国家把文学工作者全部包下来、把文学活动全面管起来为特征。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更具有全能国家的特点,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并且摸索出了一套让文学服从于革命的政治、让作家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权需要的制度框架。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给这种制度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文学体制的破旧立新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和途径。文学讲习所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央文学研究所诞生于 1950 年秋季。

我曾就丁玲为什么要创办文学研究所,采访过丁玲的先生陈明。陈明说:“当时(1950年),田间、康濯、周立波、马烽和我们都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他们与丁玲有的是在延安、有的是在晋察冀就认识。大家长期相处,丁玲有一种感觉:这些同志,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写东西,但是战争环境中读书的机会很少,看作品的机会很少。如果在和平、安定的环境给这些同志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好了。在和田间、马烽、康濯他们聊天时,他们都甚有同感。丁玲也觉得对他们有一种责任,就决定搞一个一边学习一边创作的环境。并向组织反映了这些想法。”^①



1951年三八节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届女学员

作家马烽在《文研所开办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谈的与陈明说的比较吻合。马烽说,1949年,他参加过第一次文代会后,被留在了新成立的“文协”(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地点就在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机关。他说:“不久之后,

听说文化部把原北平艺专改成了美术学院,同时正在筹建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我猜想一定也会成立一个文学院。那样我就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②后来,得知文化部根本没有创建文学院的打算,他就寄希望于文协来办,并和当时的文协副主席丁玲讲了。丁玲说她和文协的其他领导交换过意见。1950年马烽在文协召开的一次茶话会上,向文协的其他领导也提出了这个建议:希望文协能够创办一个文学院,使一些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有一个进修的机会。

1949年筹备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题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他”的座谈会,都是由茅盾主持。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茅盾就谈到:“苏联作家协会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学生们经常提出问题来,有时个人解答觉得很难中肯,文协应该对青年尽量帮助和提高。”^③郑振铎也在这次会上说:“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天才,就介绍到文学研究所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那里毕业的。”^④

1950年2月25日周扬署名的文章《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和今年工作任务》,对“今年”的工作提出几个重点:1.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下部队;2.筹备文学研究所;3.建立批评小组……^⑤

作家徐光耀根据他1950年—1953年的日记及回忆,谈到为什么会创办文研所,他说:“195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见陈森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缘由,大意说:(一)解放不久,

毛主席找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声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二)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很可能是龚察尔),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⑥



1948年6月,中央妇委欢送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联二次代表大会,后排右二起李伯钊丁玲邓颖超、右七张琴秋、左一杨之华;前排右二韩启民,右三吴青

据作家刘德怀回忆,他刚到文研所时,陈森向他介绍的情况是:“前不久刘少奇访问苏联,回国后找到丁玲谈起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培养青年作家,我国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培养文学人才的机构。丁玲很乐意为新中国培养青年作家尽力,从住房到经费,从人员调动到学习计划的筹划,及领导成员的确定,丁玲每天奔跑,使建所